

doi:12 3969/j issn 1672-0598 2010 04. 011

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

——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张莉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以闽南地区为切入点, 揭示近代华侨的投资直接影响、制约着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范围和深度: 外向型的工业、近代化的城市、商业消费的物质生活。但这种变迁并不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内在良性发展的基础上, 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受多种不稳定因素左右的侨资上, 因而极其脆弱。

[关键词]华侨; 近代投资; 社会经济变迁; 东南沿海地区

[中图分类号] F12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10)04-0060-04

有关近代华侨投资的研究成果, 主要以 20 世纪 80 年代林金枝的论文和著作为代表, 此后也有一些^①。然而, 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华侨投资的区域经济行为, 没有把此行为置于“大历史”中研究近代华侨投资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变迁。本文以闽南为切入点, 研究近代华侨投资对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一、近代华侨投资的发展变化

中国最先与海外接触的地方是南洋一带。华侨移居于南洋, 可远溯至秦汉。东南沿海一带主要是福建、广东的人民, 由于经济的窘迫和自然环境的便利, 为生存而不断向外移殖, “遍于太平洋区域, 这是国际关系各方面的一个重要事实。激动世界的政变尽管发生, 但是向外移民却依旧埋头进行, 这种移民, 比地图易色, 领土更改尤其重要。”^{[1] 132} 扼闽南咽喉的厦门因优越的地理位置, 开埠前就成为移民海外的交通要孔。开埠后, “从厦

门前往英属海峡殖民地的移民劳工人流从未间断”。^{[2] 512} 1939 年华侨总人数 8 321, 343 人中 34% 为闽籍, 南洋各属(台湾地区、日本除外)闽侨占华侨总数超过 36%; 而闽侨总人数 2 829, 921 人中, 有 95% 以上散居南洋各地。^{[3] 12} 由此可见闽侨与南洋的密切关系。

19 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福建南部向东南亚的移民潮, 基本上是由青壮年男子组成的。他们在移居地安定后, 通常都会汇款回家乡。已有的研究表明, 经由厦门进入福建南部的, 来自东南亚各地的侨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据历年华侨汇款数额估计表(1905—1938 年)计算, 侨汇总额占福建省 93.2%, 占全国 12.4%。^{[3] 97} 侨汇的用途主要包含非生产性投入和生产性投资。非生产性投入包括赡养家眷、支持革命、兴办学校等, 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生产性投资系指海外华侨为获取经济效益

* [收稿日期] 2010-04-15

[作者简介] 张莉(1972—), 女, 四川简阳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 博士生, 在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工作, 主要从事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① 主要研究成果有: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 1980 年第 1、2 期;《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上海卷》,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林金枝、庄为玘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王荣林:《略论近代华侨投资对东南沿海经济的作用》,《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3 期; 魏明枢:《晚清时期客家华侨在国内的经济投资》,《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6 期; 戴鞍钢:《海外华侨华人与清末民初东南地区社会变革》,《历史教学问题》2004 年第 1 期; 吴妙娴、唐孝祥:《近代华侨投资与潮汕侨乡建筑的发展》,《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黄美缘:《清末和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6 年第 3 期。

而垫付货币或其他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总额约 7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 700 多万元。^{[4]627}在福建投资金额近 1 亿 4 千万元,其地区分布为:厦门 8 700 万元,占 63%;漳州 950 万元,占 6 8%;泉州 800 万元,占

5 74%;福州 670 万元,占 4 6%;晋江 680 万元,占 4 8%;南安、永春各 300 万元,占 2 2%;其余为安溪、莆田等地。^{[5]101-102}下面两表直观地反映了近代华侨在国内及厦门投资的概貌。

表 1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投资数额统计表(单位:人民币元)^{[6]4}

时间	投资企业数	投资金额	每年平均投资额
1862—1919	1 395	126 391 638	2 179 338
1919—1927	5 904	167 540 769	20 942 596
1927—1937	12 253	250 655 092	25 065 509
1937—1945	1 271	28 011 794	3 501 474
合计	20 823	572 599 293	51 688 917

表 2 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数量统计表(单位:人民币元)^{[4]628}

时间	投资户数	投资金额	平均每年投资数
1875—1919	50	8 300 000	188 636
1919—1927	320	16 200 000	2 025 000
1927—1937	2 019	53 346 598	6 668 324
1937—1945	10	400 000	50 000
合计	2 399	78 246 598	8 931 960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近代华侨投资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初兴期(1862—1919年)、发展期(1919—1927年)、高峰期(1927—1937年)、低谷期(1937—1945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始于 1872 年,厦门的华侨投资也始于同一时期,但是当时的投资数量是很少的。甲午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的涌入、中华民国的建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 20 世纪初华侨投资的初兴期。“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华侨投资呈上升趋势。从全国来看,每年平均投资数全国为 200 余万元,比初兴期每年平均 20 余万元,增加了 10 倍。厦门每年平均投资数 20 余万元,比初兴期每年平均 1 8 余万元,增加了 11 倍。1927 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是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华民族危机逐渐深入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资本和华侨投资的高峰。无论从投资企业数、投资金额和年平均投资额都是跳跃式增长,在整个近代时期处于波峰之巅。但这一时期的投资并不是直线上升的。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华侨投资在 1932 年左右就开始减少。抗日战争是中国社会经济严重受挫时期,也是华侨投资跌入低谷的时期。华侨投资数量急剧下降。华侨在全国的年平均投

资 35 万元,仅为 1919—1927 年间的每年平均投资数额 1/5 强。厦门每年平均只有 5 万元投资,还不及发展期 202 万元的 1/40。

二、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

华侨在生产性投资方面与非生产性投入相比,资金要小得多。据有关方面材料的综合推算,从 1862 年到 1945 年的八十多年历史中,全国华侨汇款总数为 331 000 万美元,投资总数为 12 137 万美元,投资占侨汇 3 67%。^[7]根据厦门的材料推算,从 1905—1938 年的三十四年中,厦门华侨汇款 461 260 000 美元,投资总数为 11 581 218 美元,投资占侨汇的 2 51%。^{[8]155}虽然华侨生产性投资是很有限的,但客观上在一定范围内却对东南沿海的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华侨投资的经济行为推动了东南沿海外向型工业的进程。据估计,近代华侨资本约占广东民族资本的 40%,占福建民族资本的 60%。^{[9]60}在中国迈向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资金短缺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华侨将在海外积累的资本投资于国内企业,无疑增加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对扩大再生产具有推动作用。这种投资供给和投资需求造成的投资运动,虽说数量并非很大,但还是引起了中

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在局部由封建、半封建向资本主义性质的悄然转变。根据《1904—1931年海外华侨投资厦门工业一览表》^[8], 华侨资本约占资金总额的 80—90%。东南沿海地区和内地的近代工业相比较, 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点。如厦门近代唯一用电力作为动力的裕昌米粉厂, 每月出产十余万斤米粉, 除行销本市外, 大批配运南洋各地。厦门二十余家酒厂每月产量为五六千斤以上, 销路除厦门和鼓浪屿之外, 多配运台湾、香港、广东、南洋群岛。^[10]¹⁰²⁻¹⁰⁴ 抗战爆发前, 握华南罐头业之牛耳的厦门淘化大同酱油厂, 产品优良, 销售之广, 远及国内各大都市以及南洋群岛, 甚至扩展到英、美以及丹麦、挪威等国, 年盈利 9 万银元, 产品“宝塔牌酱油”曾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8]¹⁹¹

其次, 华侨投资促进了东南沿海城市的近代化程度。就厦门来说, 市政建设(主要集中于 1927—1932 年)是华侨投资所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厦门“自马路的兴建, 堤岸的建筑, 以至公园的开辟, 一变旧日污垢的面貌, 打开市厦港及禾山的交通阻隔, 成为闽南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11]¹²⁵ 据统计, 整个城市建设工程耗资约 1 330 余万元, 其中华侨的投资占 60—70%,^[12]¹⁷³ 以房地产业为最多, 约占投资总额的 65.17%。^[13] 厦门的商业情形, “可以从汇款方面的资料中, 得到解释, 而且只有从汇款方面加以解释。地产事业的活跃正与投资汇款激增的资料相适应”。^[11]¹³⁹ 抗战前 10 年中, 厦门华侨汇款, 以 1931 为最多, 曾达 7 200 万元, 嗣后逐年低减, 至 1935 年为 4 400 万元^①。^[14]¹⁴ 巨额的华资给了厦门地产投机相当的刺激。1908—1938 年, 共有 2 145 户华侨在厦门建置房产, 资金总额约计银洋 8 000 万元。1927—1931 年的 5 年间, 华侨在厦门开设的房地产公司, 资本超过 20 万元的有 36 家, 资金总额达 3 000 万银元。当时厦门市面私有楼宇计 7 000 余户、1 万多幢, 其中属于华侨所有的占 50% 以上, 近 140 万平方米。^[8]¹⁷¹ 大量侨汇的流动, 在东南沿海地区编织成一张特殊的资金流通网络。支撑这一网络动作的主要中介组织, 是被称为“信局”的一种特殊华人民间金融机构。“信局此种商业, 纯为华侨汇款机关, 在国内仅闽、粤两省特有。”^[14]¹⁶ 信局最盛时, 福建共 185 家, 在厦门规模大的有 153 家。^[12]⁸⁹ 据估计, 1905—

1938 年厦门侨汇每年约在 2 000 万——6 000 万元之间。^[3]³⁰⁻³¹ 巨量侨汇涌入刺激了银行业的繁盛。1921—1930 年间有 6 家新的银行开张, 1931—1936 年则有 10 家新的银行开张。而厦门银行总数也 1920 年的 6 家, 增加到 1936 年的 16 家, 增长了 1 倍。^[15]²⁶¹⁻²⁷⁰ 这些银行中, 纯由华侨开办的有 4 家, 即: 中南银行、中兴银行、华侨银行、厦门商业银行。“厦门金融业是靠了华侨存款汇款才能支持。一旦华侨经济力量退出了厦门, 厦门只留下一个荒凉的外壳了。”^[3]²¹ 虽然现代的金融通汇机关——银行在侨汇的浇灌下发芽成长, 但在侨款收汇上旧式的金融机构——民信局仍不失其重要地位。华侨汇款“十之八九还是由民信局汇回。”^[3]⁷¹

第三, 近代华侨投资的社会效益在一定层面上拉动了商业消费的物质生活。19 世纪 60 年代后, 东南沿海地区的各业多有华侨的投资, 在一定范围引发了人们谋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华侨社区, “商业的空气弥漫于民间。无论老幼, 如提到生计的出路问题, 视线的焦点, 立刻集中在商业上头。”^[12]⁷⁶⁻⁷⁷ 民国时期大抵越靠近厦门的县区, 第三产业人口比例较其他地区高。据 1937 年省政府统计, 同安、金门、禾山三县男性商业人口比例分别是 31.8%、39.7% 及 31.8%。距离厦门较远的石码、晋江、惠安的比例分别是 38%、20.2% 和 21%, 位于闽南经济腹地边缘的莆田县比例是 13%。至于闽南以外县份的男性商业人口比例, 除永定县达 21.2% 外, 普遍较闽南各地为低。如闽东的长乐、连江、罗源、闽清四县分别是 0%、0%、3.1%、9.1%, 闽北的尤溪、建阳分别是 3.6% 和 9.1%。^[16]¹¹⁵ 经济网络创造的巨额财富积聚到商人手中。按照近代西方工业国家发展过程, 商人资本积累将演化成工业资本, 刺激工业演进。但近代闽南侨商的资本却大多流向了物质消费领域。一侨居菲律宾的闽籍华侨在通信中写到, “予于昔年, 走过大江南北, 且沿津浦路入北京, 折往山西, 所见乡村其人烟之稠密, 建筑之壮丽, 用度之奢侈, 诚未有若闽南者。就晋江一县言, 计八百余乡, 皆聚族而居。大乡者万余人数见不鲜; 小乡亦百人以上。其生活皆藉南洋为挹注。各乡红砖白垩之建筑物, 弥望皆是。婚嫁之费, 普通人家皆在千金以上。”^[17]⁴⁷⁴⁻⁴⁷⁵ 此外, 近代厦门的对外贸易总额虽不

① 在《福建省统计年鉴》一书中, 战前华侨汇款 1931 年为最多, 高达 8 000 万元, 1932 年急剧跌落到 4 780 万元, 至 1934 年为 4 330 万元, 1935 年为 5 123 万元。福建省政府统计处编印:《福建省统计年鉴》, 1937 年, 第 1033 页。

大,但人均贸易额却相当可观。如 1912 年人均贸易额为 295 元,1927 年为 553 元,远远超过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上海而列居榜首。^{[18] 25}其中以洋货的进口为主,“几乎全是为了满足本地区的需求。”^{[19] 36}自 1903 年(自该年始有统计)以来,就贸易总数言,厦门无时不为入超(进出口贸易值的比例保持在 11:1^{[3] 29}),堪为“洋货倾销之尾闾”。^{[3] 30}近代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社会生活或多或少具有消费型的特征,但厦门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典型。

三、评价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

受华侨投资影响的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是极其脆弱的。华侨资本的大量涌入,可使东南沿海地区金融宽松,贸易活跃,市面繁荣;反之则金融奇紧,贸易疲弱,商业萧条。尤以靠着侨汇以滋荣经济的厦门受这种影响更大。这种脆弱性的根源是变迁不是建立在社会自身内部经济结构良性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受多种因素左右的侨资上。华侨投资增减的因素概其大端主要有:(1)侨民在海外的收益能力;(2)海外的经济形势;(3)投资利得大小;(4)投资去路;(5)国内外政治安定与否;(6)利率的高低;(7)通货管理政策;(8)汇兑率;(9)季节变动。虽然这种变迁是脆弱的,但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广阔土壤中它如破土而出的奇葩,散发出清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雷麦. 外人在华投资 [M]. 蒋学楷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2]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 4 辑)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 郑林宽. 福建华侨汇款 [M]. 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印刷所,1940
- [4] 汪方文. 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 [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
- [5] 华金山. 福建华侨史话 [M]. 福州: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1983.
- [6] 林金枝.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7] 林金枝.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 [J]. 近代史研究,1980(1): 229.
- [8] 《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 厦门华侨志 [M]. 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 193.
- [9] 林金枝.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 [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 [10] 吴雅纯. 厦门大观 [M]. 出版地不详,新绿书店经销,1947.
- [11] 张镇世,郭景村. 厦门早期的市政建设(1920—1938) [C] / 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厦门文史资料(第一辑),1963.
- [12] 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M]. 商务印书馆,1938.
- [13] 林金枝. 论近代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及其作用 [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4): 113.
- [14] 张公量. 关于闽南侨汇 [M]. 泉州: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1993.
- [15] 《厦门金融志》编委会. 厦门金融志 [M]. 厦门:鹭江出版社,1989.
- [16] 福建省政府统计处编印. 福建省统计年鉴 [G]. 1937.
- [17] 陈文涛. 福建近代民生日理志(下卷) [M]. 福州远东印书局,1929.
- [18] 福建省政府统计处编印. 二十八年来福建省海关贸易统计 [G].
- [19] 《厦门海关志》编委会. 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 [M]. 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杨 睿)

On the Investment of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Southeast China

— Centered on South Fujian District

ZHANG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outh Fujian areas,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directly influences and restricts the scope and depth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such as export oriented industry, modernized cities and material life of commercial consumption. However, these changes are not based on inner and goo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to some extent, these changes are fragile because they are based on the capital of overseas Chines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many uncertain factors.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modern invest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southeast coastal area of China